

自由谈

让法官心无旁骛地审案

——聚焦深圳法官职业化改革(中)

傅达林

法官流失或许只是职业化改革的浅层次原因，其更深的动因在于破除司法内部的行政化，真正将独立公正审判的权力交还给法官。如果将法官职业化改革的目的仅限于防止法官流失，就大大降低了改革所蕴含的深层价值。

在一国的法治大厦中，司法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杰斐逊说过，司法“这一分支将担负处理冲突的重任，因为他们是理性最后的上诉地点”。司法的公正、权威与尊严，一切都来自其审判意志的独立自主。恰恰在这一点上，中国司法堪称“内忧外患”：外部体制上人财物受制于地方，为“五斗米”而不得不“折腰”；内部体制上

审案的法官往往“说了不算”，法官袍依然敌不过“乌纱帽”。

无论是外部体制还是内部体制，弊病的共同症结就是禁锢了审判意志的自主，司法的人格难以独立。为此，十八届三中全会设计了外部去地方化、内部去行政化两大改革目标，并分别开出了“药方”。但人们关注较多的是司法体制外部上的独立，对省级统管等改革动向抱有厚望。与旨在实现“法院独立”的外部体制改革不同，内部管理体制的去行政化不仅直接影响司法的品质，而且不太涉及司法机关与执政党、其他国家机关之间的权力配置，无需动大的“手术”便可能获得良好的改革效应。一旦实现了司法内部的去行政化，司法职业规律的演进，便可进一步带

动整个司法系统在国家中的地位提升，为司法去地方化提供资源。

从内部改革视角来看，去行政化的关键是在法院内部实现行政管理职能与司法职能相剥离，实现“法官独立”。每个法官的独立是审判独立的最根本的表现。正如德国法学家拉德布鲁赫所说：“法律借助法官而降临尘世”。法官作为司法的首要操作者，如果其行为受到干预和不当制约，审判独立必然成为空谈。在我国，法官独立的制度建设一直处于空白状态，法院内部行政化倾向严重。今年的最高法院工作报告，就将“一些法院管理行政化色彩浓厚，影响了审判质量和效率”列为问题之一。

例如，在审判管理方面，判而不审的审委会制度、院长批案的惯例、指标主

导的绩效考核机制，无不体现行政化的特征，共同点是否定了法官判案的意志自主；在人事管理方面，法官的选拔、任用、考核、升迁、奖惩、职级设置，均援用行政化的层级管理制度。正如有学者指出，这种行政化的选拔任命方式，抽掉了法官独立的最重要基石，使得法官成为听命于上级的普通办事员，加上等级森严的晋升奖惩机制，司法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就在这种行政体制下被层层消解。

司法公正是建立在法官独立自主的判断意志上，保障法官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乃是人人从治的司法走向法治的司法必由之路。《司法独立世界宣言》提出：“法官在做成判断之过程中，应独立于其同僚及监督者。任何上级司法机关或

任何高级的法官，均无权干涉法官自由地宣誓其判决。”因为司法的属性决定了，法官的等级只是一种职务层次，不同等级的法官之间不应存在行政隶属关系，这样才能保证每一个法官都有自主的判断能力，才可能实现“审-判-责”的一致。

深圳的改革方案规定，不同等级之间的法官没有行政隶属关系，各法官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失为突破当前法官意志受行政化羁绊的关键。但是在管理制度上，如何有效防止院长、庭长对主审法官的干预，如何将各种隐含的行政化藩篱彻底剥离，尤其是学界长期呼吁的改革审委会、取消批案制等，仍然需要足够可行而有效的制度设计，以真正让判案的法官心无旁骛、专心致志。

冰点时评

高考改革的重点是尊重学生选择权

熊丙奇

近年来，高校招生腐败案件已呈多发趋势，自主招生、补录及调换专业3个环节成为招生腐败重灾区。去年年末的中国农业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蔡荣生“不排除因招生问题”被查一事，让高校招生环节中的腐败问题再次成为焦点。日前，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搜狐新闻客户端，对18272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91.2%的受访者认为当前高校招生腐败问题严重。87.7%的受访者直言，自己身边就有送钱送礼上大学的情况。受访者中，高校学生占27.3%，学生家长占34.7%，高校教师或行政人员占8.7%。《中国青年报》3月18日)

如何拯救高校招生公信力，是推进高考制度改革中，教育部门 and 高校必须直面的问题。在笔者看来，高校招生公信力极低，主要与两方面因素有关。

其一，招生不公开、不透明。虽然早在2004年教育部就推出了“阳光高考”工程，要求各地做到高考招生信息公开、透明，但这项工程不尽如人意，尤其是在特长生招生、高考加分、自主招生方面，高校的信息公开并没有达到“阳光高考”的要求。而耐人寻味的是，即便信息不公开，也没有任何地方教育部门、高校被问责。比如，2009年，媒体曾一再质疑浙江高考体育加分存在权势交易，信息不公开，可浙江教育部门的措施是，进一步减少体育加分公示的信息。上级部门也没有进行问责。

其二，高考改革的程序设计出现偏差。具体表现在，一方面，改革由教育行政部门主导，公众没有参与权和决策权，比如，自主招生改革，是由行政部门推动的，为什么推进自主招生、自主招生怎么进行、怎样保障自主招生的公平，有关部门在决策时并没有听取公众的意见，以至于在过去10年间，自主招生的政策每年在变，2013年的自主招生，临到2012年年底，才公布考试科目，先确定的是联考时间，随后又推后，决策很随意。

另一方面，我国正在实行的自主招生改革，将自主招生与集中录取制度嫁接，把高校的个性化测试放在统一高考之前，自主招生没有突破单一的分数评价体系，整个基础教育还是盛行应试教育。而科学、合理的自主招生应该与集中录取脱钩，允许学生与学校双向选择。学生参加统一高考，学校依据统一高考成绩提出申请成绩要求，达到成绩要求的学生自主申请大学，大学根据统一测试成绩、自主面试考察成绩、中学学业成绩综合评价录取学生。简单地说，就是变以前的“统一高考+集中录取”为“统一高考+自主招生”。

香港地区高校在内地自主招生就用统一高考成绩作为申请的笔试成绩，国外一些大学，诸如悉尼大学也认可我国的高考成绩，我国高校没必要自己或多校联合搞笔试，在学生参加学校笔试、面试之后再参加统一高考，这是对自主招生本质的误解，也是对基本程序的颠倒。

如果考生可以申请若干所大学，可获得若干所大学录取通知书，将充分扩大学生的选择权，而选择权是受教育者最基本的权利，有了选择权的受教育者，将进一步拥有对大学的监督权、评价权，教育部门、学校面对有选择权的受教育者，不得不做到信息公开、确保公平公正。

而我国当前高考录取制度的基本特点是，每个学生只能获得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也就是说，学生缺少选择学校的权利。权力于是主导整个高考，不受制约与监督，腐败由此滋生。高考改革的重点应该是改革录取制度，只有以扩大受教育者为核心的深化高考改革，高校招生腐败的土壤才能逐渐铲除，也才能重树高校的招生公信力。这同时也是把基础教育从应试教育中解放出来的需要。

晏 扬

广州市物价局近日公布“停车场差别化收费方案”：一类地区住宅小区露天停车场从过去每小时1元上涨到每15分钟1元，上涨幅度达300%；路边咪表停车从每15分钟2元上涨到每15分钟5.5元，最高限价由80元/天提高到176元/天，涨幅均超过200%；商业停车场由半小时5元上涨到15分钟4元，涨幅为60%。《人民日报》3月18日)

此次广州市停车费上涨幅度之大，确实令人咋舌。显然，此举意在提高车辆使用成本，使人们减少开车出行，以缓解交通拥堵。在本质上，提高停车费相当于变

支付宝们打压得了吗？



朱达志

自央行发文叫停二维码支付和虚拟信用卡之后，前两天又有报道称，央行已向第三方支付企业下发《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法》和《手机支付业务展业指导意见》草案，用于征求意见。据悉两个草案对第三方支付转账、消费金额进行严格限制，包括个人支付账户转账单笔不超过1000元，年累计不能超过1万元；个人支付账户单笔消费金额不得超过5000元，同一个人客户所有支付账户消费月累计金额不得超过1万元等。

近来，央行针对互联网金融接二连三出招。坊间普遍认为，互联网金融产品正在或将要受到严格限制乃至围剿，第三方支付行业所面临的政策环境在进一步收紧。有评论称，这种做法与改革逻辑背道而驰，与创新精神格格不入——而只有容得下网络金融，中国经济才谈得上有真正的创新和改革。

网友的反应更是清一色的吐槽：“我妈都没管我一个月在网上花多少钱，央行

你凭啥管我！”也有网友调侃：“得了多年的网购上癮症，终于有望治好了！”其实是发泄不满。是啊，一千元、五千元这样的低限额，其实是侵犯公民的自由消费权，扼杀蓬勃兴起的电子商务、网络金融、虚拟经济。

不过，我却没有那么悲观。上述两个文件只是草案，还在征求意见，相信有关各方绝不会放弃充分博弈的机会，最终的结果会是一个各方都能基本接受、且最大限度趋于合理的办法出台。18日，针对有用户关心未来购买余额宝等理财产品是否将受到限制的问题，支付宝公司在其微博上表示：第一，征求意见稿属于草案，也就是说还处于草拟阶段，并未正式颁布，更没有实施。每一个管理办法的出台会经历很多版本的草案，公司已经将相关的意见反馈给央行，并且正积极与央行进行沟通中。第三，既然并不是正式意见，因此对余额宝的使用不会有任何限制。支付宝的淡定，并不一定是装出来的。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

展，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让金融成为一池活水”。有专家认为，互联网金融是当代经济的灵魂，是金融革命3.0，它必将不断改写传统金融的历史。诚然，互联网金融为个人、企业、地区和行业带来的产业价值无可限量——它不但免却了传统交易中的巨额成本，而且还填补了传统交易中的大量空白，并且促进传统产业更新转型，促进产品、技术、资本和人才深度融合。这种趋势不可挡的趋势，靠一纸限制交易的政令（姑且假定它木已成舟了吧），扼杀得了吗？

另外，别小看了亿万消费者的力量。2011年6月1日新华社播报，业内人士称“第三方支付年交易规模有望在未来三年突破3万亿元。”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预测远远低估了虚拟经济和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势头。2013年7月，赛迪顾问公司发布报告称，仅该年上半年，中国第三方支付企业就实现交易规模6.91万亿，其中银联商务第一，支付宝紧随其后，汇付天下第三。这是亿万网购大军的众志成城，央行“得罪”得起吗？

漫画/徐 简

该不该出手救房企

谭浩俊

浙江奉化一家负债总额高达35亿元、涉及近20家银行的房企，因为资金链断裂，正面临严重违约的风险。对此，相关媒体也给予了高度关注，有关当地政府正在为这家房企设计托盘方案的消息也是不脛而走。一家境外媒体更是道听途说，发布中国央行正在牵头对该家房企进行救助的消息。

对此家境外媒体不负责任的报道，央行也迅速作出回应，并给予强烈谴责。但是，有关该不该救这家房企的争论却并没有因此而结束。

笔者推断，地方政府一定不会袖手旁观。理由很简单，一方面，这家房企的债务涉及近20家银行。如果地方置之不理，银行就有可能将怨气撒在地方政府身上，用诸如联手制裁等手段，迫使地方政府出手相救；另一方面，能够得到这么多银行的支持，在企业自身抵押物并不充分的情况下，其他企业为其担保的现象一定

十分严重。如果不对该企业进行救助，就极有可能产生连锁反应。显然，这也是地方政府最为担心的地方。

问题在于，如果采取救助措施，万一其他企业也发生类似问题，是否也需要政府的救助呢？地方政府应不应该、有没有能力反复对陷入困境的企业进行救助？

更值得注意的是，银行敢于在明知风险很大的情况下，仍然给包括这家房企在内的风险企业贷款，而企业也是在明知风险很大的情况下不断融资、不断制造债务黑洞，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都紧紧抓住了地方政府的软肋，认为地方政府会在企业出现重大风险时出手相救。即便政府自身没有能力，也会利用行政手段迫使能够指挥得动的国有企业相救。

问题在于，如果政府不遗余力地为银行、为企业的错误决策买单，一直用行政手段干预市场，那么，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何时才能发挥呢？银行也好，企业也罢，何时才能真正按照市场规律进行生产经营呢？为什么在货币严重超发的

情况下，多数企业仍然资金严重短缺，为什么房企敢于大规模负债经营，都与政府角色错位有关，让银行和企业有空子可钻。

也许，对奉化的这家房企，如果地方政府坐视不管，确实可能会引发比较大的社会不稳定因素。但是，政府的出手相救，就会给其他企业、特别是房企一个不正常的信号。退一步讲，即便出手相救，也应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严厉追责，且不仅包括银行工作人员、领导，也应包括开发商。如果造成了比较大的损失，还要追究相关责任人的刑事责任，而不是政府买单，银行和企业也就大功告成了。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要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如果对一家完全市场化的房企政府都要出手相救，都不愿意或不敢让其按照市场规则处理已经形成的债权债务，那么，企业还怎么能够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呢？赚了钱归银行和企业，出了险推给政府，还有何市场公平可言？

“积分落户”不能只看上去挺美

王钟的

不久前，《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发布，提出特大城市可采取积分落户制。相比上海、广州等已经试行积分制的城市，北京是否会采取这一制度特别引人关注。2011年北京市政协常委会就曾经提过实施积分落户的建议，但是并没有实质措施推出。刚出台的“规划”，为包括北京在内的特大城市实施积分落户重新点燃了希望。

在总体有限的落户指标情况下，如何合理分配名额是考验城市管理者的难题。“积分落户”虽然不是一个完美的分配手段，确是目前看来较为尊重人才的方式。这里不妨举个常见例子，毕业生甲在校期间动手能力强，毕业后被某民营科技公司聘用，有机会参与创造很大一笔社会财富，但因为公司没有户口指标只好成为“京漂”；而毕业生乙为人踏实稳重，听从父母建议进入体制内单位，以机关公文写作为日常工作，拿着未必高的薪水，却已把摇号购车、买房提上议事日程。这里并非比较两个职位孰优孰劣，不过不难看出，按指标落户的旧政可能压制年轻人的闯劲。

按指标落户的政策无疑是特大城市就业市场的一大非市场因素。很多单位其他“软硬件”未必足够吸引人，只因为有户口指标，就有可能吸引很多毕业生前来求职。户口背后是各项福利，毕业生作出有利于己的选择，无可厚非。要质疑的就是这种无奈选择带来的后期隐患。首先是某些城市可能招来了人，留不住人心，合同期一满就有年轻职工

辞职的现象普遍存在。另一方面，也有用人单位恃户口为金字招牌，生怕揽不来优秀人才，但在招人后疏于激发新人潜能，也没有能力在薪酬、软环境方面有措施。

因此，积分落户最大的意义在于，就业市场中各用人单位能够享受平等的主体待遇，求职者也能够按能力取得落户资格，不再为一些非市场因素所困扰。当然，这个看上去很好的措施实施起来有很大阻力。首先是一些传统上能够获得落户指标的企业，是否能够割舍这块吸引人的诱饵——如在北京，他们恰恰是人口中所说的“体制内”国企、事业单位，所能够动用的权力资源不容小觑，有能力让积分落户制符合自身利益方向产生。另外，积分落户能否实现用人单位的彻底平等，也要打上一个问号。实施非本地生源应届高校毕业生积分落户制多年的上海，也不是所有单位能够协助新人实现落户，如果以“人事代理”等方式入职，就可能面临分数再高也无法落户的困局。

此外，怎样制定一个合理的积分标准，恐怕是横亘在决策者眼前更直接的问题。在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的背景下，吸引什么样的人进城实际上就是一项宏观调控政策。有关城市在制定标准时，向符合自己优先发展产业的从业者抛去绣球，现在看来无可厚非。可是，一些生硬的标准也容易让造假者有利可图，如某些城市在设置积分标准时，将是否拥有专利证书、是否创办过企业列入其中，这些标准容易催生“曲线救国”的灰色产业。一些人花钱满足一些指标要求，就扰乱了原本美好的积分落户制了。

“护遗”远比“申遗”重要

陈甲取

据韩联社16日报道，韩国拟将暖炕技术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该消息一出，有中国网友呼吁有关部门把与暖炕技术类似的火炕技术申请非遗。文化部非遗司的工作人员介绍，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在推荐何种项目申报时，会请专家论证哪些项目更合适申请，“我们不会按照韩国的节奏来走。”《新京报》3月18日)

2005年，韩国申遗“江陵端午祭”时，很多人想起我国传统的端午节，本是同根同源，却被韩国钻空子抢先“盗用”，其他诸如中医、汉字、风水，也被韩国一一“抢申”，这一度给国人带来情感上的失落与迷茫，让不少国人痛并愤怒着。然而细思之，大可不必如此，我们的关注点理应更多地落脚在文化遗产的保护上。

即便韩国不抢先申遗，我们会对端午、暖炕技术等“敝帚自珍”吗？中华文明数千载源远流长，值得永久保存、纪念的文化遗产和传统技术数不胜数，远比“暖炕技术”更具有历史价值的民族文化遗产多了去了，在韩国抢先机申遗之前，引起了必要的关注吗？并没有！恰如有网友所言：“我家祖上的锅

碗瓢盆多了去了，难道什么都要去申遗？”

一位民俗学家说：“文化是大家可以共享的，不像面包，你要是多咬了一口，我就会少咬一口。千万不能拿着待面包的眼光来看待文化遗产。”这话很有道理。即便韩国拿着具有中华特色的文化遗产成功申遗，也不能说明该项文化遗产发明权属于他们。申遗与否，与保护传统文化与技术并无必要关联。

文化部工作人员的说法让人欣慰，“申遗不按韩国的节奏走”，彰显了我们在申遗观念上的理性回归。为申遗而跟风较劲，紧跟别人的节奏，只会迷失自己的路。与其盲目追随或争抢申遗，或是对韩国的“抢申”行径大加抨击斥责，倒不如反躬自省，我们在保护民族文化遗产方面做了哪些传承和推广工作。

申遗的成功，并不能解决传统文化的失落或没落。申遗不是为了炫耀或装点门面，而是要在申遗后引起人们的重视与认同，从而使得民族文化遗产能够得到更好的传承与保护。要不然，申遗成功后，那成果只会束之高阁，变成一长串遗产名录中的一员而已。如此，则申遗的意义何在？

政府就别操心如何收停车费了

路边停车收费也应该由政府定价。但是，住宅小区停车场、商业停车场怎样收费，却不应该由政府说了算。道理很简单：这些停车场既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公共场所，也不是政府所属停车场，若其收费标准实行政府定价，犹如由政府给餐馆的饭菜定价，管了不该管的事，名不正言不顺。

具体而言，住宅小区停车场的收费标准，应该由小区物业与业主协商确定，政

府没必要插手干预，商业停车场的收费标准，则应当“随行就市”，由市场来调节，政府不应该也无权强令其涨价。停车场也是讲求经济效益的，当停车位总体上供小于求，无须政府强令，他们自然会涨价；而当停车位总体上供大于求，政府强令其涨价，必然导致一些停车场“生意”冷清、收益下降，以至于车主、停车场经营者双方都不满意。在这方面并非没有“前车之鉴”：此前，北方某市提高中心城区

市场能够自行调节的，政府就要退出。这些要求代表着当前改革的大方向，需要各级各地政府切实转变观念，依法规范使用手中的权力。

近年来不少地方都取消了停车收费的政府定价，比如前不久合肥市将停车收费分为两种模式：机场、车站、码头的停车场以与政府兴建的公共停车场，收费标准实行政府指导价；商业停车场以及商场、酒店、娱乐场所、写字楼的配套停车场，收费标准则实行市场调节价。

相信市场的力量，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政府不必管、不该管的事情就不要管。只有这样，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才能逐步理顺。